

外语教材编写活动对教师学习的影响*

——以高中新课标英语教材编写项目为例

武丹丹 司 露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以某新课标高中英语教材编写项目中的九位中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收集半结构化访谈、教师反思、文本资料等数据,基于活动理论,探究外语教材编写活动对教师学习的影响,提炼有效的外语教师学习机制。研究发现:(1)外语教材编写活动促进了一线英语教师的学习,学习结果体现在身份、信念、实践、情感四个方面;(2)教材编写促成一线英语教师学习的因素包括:积极的主体、明确的目标、丰富的工具、完备的规则、异质的共同体、互补的分工方式等。本研究可为未来开展教师教育活动提供启示。

关键词:外语教材编写;外语教师学习;基础教育;活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25)02-0084-13

DOI:10.13458/j.cnki.flatt.005106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相继推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等政策文件,进一步指出教材建设是中国教育的基本。中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新课程新教材(以下简称“双新”)改革自2017年启动,“这项影响最大、历时最长、惠及全国两亿多中小学学生的重大教育改革”(黄忠敬、程亮 2021: 19)对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英语是直接输入外国文化的科目,也是唯一贯穿中国大中小学教育全过程的科目(孙有中 2021),英语教师的学习与发展尤为重要,“双新”背景下外语教师学习的本质亟待探析。鉴于此,本文选取了一个中学^①英语教师深度参与的新课标高中英语教材编写项目,基于教师参与编写(以下简称“参编”)的过程,探索外语教材编写活动是否以及为何促成教师学习,以期丰富外语教师学习实证研究,并为提升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推进中小学教材建设提供借鉴。

2. 文献综述

2.1 外语教师学习

伴随着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不断发展,教师教育领域学者提出用“教师学习”替代“教师培训”“教师教育”“教师发展”,旨在强调“教师教育的终身性以及教师的主体能动性”(崔琳琳

*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五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2113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武丹丹,博士生,研究方向:外语教材发展,外语教师学习;司露(通信作者),博士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教材发展,外语教师专业发展。通信作者邮箱:lu.si@shisu.edu.cn

2013: 103)。如今,中国的政策文件和日常话语中一般仍沿用“教师专业发展”这一术语,突出宏观的结构性内涵。外语教师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普通教育学领域基本一致,外语教师学习研究日渐兴起。学者们发现,外语教师学习具有独特内涵,原因在于外语教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话中介”(dialogic mediation)(Johnson 2009: 4),外语教师天然地注重与学习者、学习环境等的互动。因此,外语教师的学习应更加注重发挥教师的能动性,而非依赖自上而下地传递知识和技能,或是局限于教师个体的知识建构。

回顾外语教师学习相关文献,现有研究多关注高校教师,针对中小学教师的研究明显不足,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外语教师学习过程、结果和条件。外语教师学习过程研究侧重描述教师学习的发生机制,即“教师个体的认知过程以及它与教师所处社团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刘学惠、申继亮 2006: 57)。然而,外语教师学习是一个非线性、个性化的过程,脱离学习结果和条件谈过程无法还原教师学习的本质。外语教师学习结果研究主要涉及教师“应该学习什么”和“实际上学到了什么”两类问题(刘学惠、申继亮 2006: 54)。前者旨在发掘教师学习的对象、内容;后者尝试探究教师学习的显性成效。已有学者研究了在自然条件下(如杨姗姗、束定芳 2021),或干预条件下(如 Van 2022),外语教师在“知识、信念、情感、实践、身份及能力”等维度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语教师在超越校本的实践共同体中的学习结果尤为瞩目,如基于课例研究的实践共同体(周洲 2023),其他类型的实践共同体亟待深入研究。此外,关于外语教师学习外部条件的研究主要关注“教师学习所处的物理和文化环境”中促进或阻碍教师学习的因素(刘学惠、申继亮 2006: 54),兼具宏观层面(如夏洋、唐雅琪 2023),和微观层面(如杨鲁新、黄飞飞 2022)。考虑到教师学习的复杂属性,有学者提出应综合多样的实证证据,提炼影响教师学习的核心要素,从而为有效促进教师学习提供借鉴(Darling-Hammond et al. 2017)。据此在普通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如 Darling-Hammond et al. 2017)开展了综述性研究,对促成教师学习的核心要素达成了一定共识,如鼓励教师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内容(content focused),支持集体参与(collective participation)和合作(collaboration)。基于元分析,Cordingley 等(2015)认为教师学习应讲求持续性和巩固性(duration and consolidation);Dunst 等(2015)指出还应在教师学习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coaching and mentoring)。在外语教育领域,中国语境中鲜有类似研究。外国学者 Taşdemir 和 Karaman(2022)采用了元综合(meta-synthesis)的方法,梳理了2006年至2020年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在职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发现英语教师学习应基于教师的需求,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应凸显英语作为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介的双重属性,语言知识和教学知识并重;应寻求教育技术支持,讲求协作;应关注教师身份认同发展;应注重可持续性、自主性等。他们还指出政策缺失、时间限制、教师负担过重等会对英语教师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外语教师学习研究对一些“本质性问题仍然知之甚少”(康艳 2022: 258)。为促成外语教师学习,以中国本土共同体为基础的教师学习结果和条件是亟待进一步探究的话题。

2.2 外语教材编写与教师学习

外语教材与教师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外语课程改革顺利落地的关键方面(徐锦芬 2023),二者的关系也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教师对教材发展影响重大。有学者

呼吁赋权一线教师参与教材编写,他们强调拥有丰富的语言教学及教研经验的教师参与编写,可增强教材的适用性和时效性(程晓堂、孙晓慧 2011)。另一方面,教材实践,包括教材编写和使用,对教师的学习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教材编写的机会相对稀缺,教材编写过程仍是外语界的一个“黑匣子”,外语教材编写中的教师学习更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徐锦芬 2023: 18)。

束定芳(2023: 30)基于多年的教材编写实践和研究,发现外语教材编写为教师构建了一个“特别的命运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他与Bouckaert (2019)均认同教材编写具备教师有效的学习活动的特征。然而,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多基于高校语境,关注大学英语教师或高校研究者的学习(杨姗姗等 2023)。研究者揭示了参与外语教材编写可促进教师专业知识(刘传江、焦培慧 2017)、专业能力(徐锦芬 2023)、能动性(Banegas et al. 2020)的增长与提升。教材编写还能助力教师重构信念,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推动专业水平提升(胡志雯等 2018)。由于外语具有文化属性,外语教材独具价值引领的特征。徐锦芬(2023)还发现教师通过参编外语教材,提升了道德情操与情感认同感。此外,目前聚焦中小学外语教材编写的研究或缺乏严谨的设计(如 Popovici & Bolitho 2003),或未将发掘教师学习结果作为主要研究目的(如 Shu et al. 2023)。外语教师在教材编写中的学习结果亟待深入挖掘,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情感等方面的变化。在教师学习结果研究的基础上,部分研究者试图探究外语教材编写促成教师学习的因素。一些中国学者发现外语教材编写通过组建成员异质性较高的实践共同体,搭建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优化了外语教育生态系统(Shu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25),拓展了外语教师合作学习范围(胡志雯等 2018)。这与 Taşdemir 和 Karaman (2022)关于宏观层面因素可能会对教师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的发现不同,中国语境下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因此外语教材编写项目机制、学术机构支持和政府顶层设计等促进了教师学习(Shu et al. 2023; Lyu & Li 2024)。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在少数关注高校研究者与中小学教师共同参与的外语教材编写活动的研究中,鲜有关于教材编写活动促成中小学教师学习的学理性讨论;第二,多数研究或侧重外语教材编写活动中的教师合作、实践共同体、教育生态理论建构,或聚焦参编教师某一维度的发展,少有研究探索教材编写活动对外语教师学习的整体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一个高中英语教材编写项目中的若干名一线中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探究教材编写过程中的教师学习结果及促成教师学习的因素。

3. 理论基础

活动理论起源于马克思对人类活动的阐释,在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心理学的构建下逐渐成型(维果茨基 2016),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外语教育研究领域(如孟亚茹、崔雨 2023; 杨鲁新、黄飞飞 2022)。本研究选取活动理论作为分析视角具有较强的适切性。该理论主张将“活动”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来解释人类发展,活动主要包括六个要素,即主体、客体、工具、规则、共同体、分工方式(Engeström 1987)这些要素持续互动最终导向结果,为研究教师学习提供了“更具整体性和社会历史性的视角”(魏戈 2019: 26)。具体来说,首先,本研究关注的外语教师学习扎根于中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情境和文化中的教材编写活动,活动理论的六要素分

析单元可系统解构该活动,呈现该活动中教师学习的社会性、情境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其次,参编教师的学习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活动理论以历时性和发展性的角度解释人类实践与发展,对于分析教材编写活动中的教师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研究旨在还原教材编写活动中教师学习的全貌,联结学习结果与学习条件,活动理论注重活动系统的整体性,这与本研究极为契合。综上,活动理论对于探索外语教材编写活动中的教师学习具有参考价值。

4. 研究设计

为了解教材编写活动中教师的真实学习经历,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试图揭示外语教材编写活动中的教师学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Stake 1995),特别是关于教师学得“怎么样”及“为什么”学的研究疑问(Yin 2018: 44)。

4.1 研究场域

本研究聚焦某套基于《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的高中英语非统编教材编写项目。该套教材由某大学科研机构组织编写,编写组的核心人员既有高校的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者,也有一线中学教研员与优秀教师,全程采用科研先导、多方协同的形式。历经了若干轮编写、试教、审核、修订、试用的循环打磨,编写组不断优化和完善教材,彰显本土特色,力争达到国家标准、国际水平。目前该套教材已通过教育部审定并投入使用。

4.2 研究问题

聚焦“双新”背景下某一国家教材编写组,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1) 参与高中英语教材编写是否影响了中学英语教师的学习? 如果是,中学英语教师在参编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2) 促成中学英语教师学习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4.3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的教材是根据英语课程标准及实际教学需要编制的教科书及其配套资源,研究者采用目的性抽样法(Yin 2018),选择包含主教材(学生用书)和配套资源(教参、练习册)编者在内的九位一线中学英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②,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研究参与者	性别	学段	职责	职称
李青	女	高中	学生用书板块负责人、教参副主编	中学高级
张帆	女	高中	教参编者	中学高级
周贝	女	初中	学生用书板块负责人、教参编者	中学高级
秦朗	女	高中	学生用书编者、教参分册主编	正高级
王君	女	初中	学生用书编者、教参分册主编	正高级
刘言	女	高中	教参编者	中学高级
郑远	女	高中	学生用书编者、教参编者	中学一级
江明	女	高中	教参编者、练习部分编者	中学一级
孙晨	男	高中	练习部分分册主编	中学二级

4.4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对九位中学英语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和他们撰写的参编反思。研究者在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后就教材编写过程、编者分工、参编体验和收获等主题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访谈全程录音,转写后发给研究对象核对(共约71,321字)。研究者还收集了研究对象在编写工作结束后基于参编经历和学习发展撰写的反思(共约19,217字)。此外,本研究还搜集了编写过程记录文件、社交软件聊天记录等文本资料作为补充和验证材料。

数据处理方面,本文使用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 12,采用质性归纳方法(Miles et al. 2013),基于研究问题对数据进行三级编码。具体步骤如下:(1) 首先逐行阅读访谈数据,找出描述“学习”“收获”“变化”“发展”的句子,提炼一级编码。例如,有教师提道,“我明显感到我的教学行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即提炼“更新教学方式方法”为一级编码;(2) 将意义相关的一级编码进行归纳,形成二级编码。例如,一级编码“更新教学方式方法”与“增进教学专业技能”归纳为“提升教学专长”;(3) 进一步凝练二级编码的类属,直至主题浮现,形成三级编码。例如,“提升教学专长”与“改善外语教材编写实践”可归入“实践改进”这一上位概念;(4) 本文两位作者分别完成前面三步后对比、整合编码,直至达成一致,最终形成数据分析结果。此外,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结合参编反思、文本资料进行互证。

5. 研究结果与讨论

对于参编外语教材是否影响教师学习,九位研究对象均在访谈或反思中给予了肯定回答。这呼应了学者对于教材编写是有效的教师学习活动的论断(Bouckaert 2019; 徐锦芬 2023; 束定芳 2023)。杨姗姗等(2023)在前序研究中发现高校教师教育者的学习结果体现在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共同体自觉和身份自觉上。与之稍有不同,本研究发现,处于同一外语教材编写实践共同体的中学教师的学习结果主要表现在身份、信念、实践、情感的转变上。

5.1 教师学习结果

5.1.1 身份协商

中学英语教师通过参编重构了外语能力者、外语教学实践者的身份,并建构了外语教材编者、理论-实践跨界者的身份。

首先,在参编过程中,中学英语教师不断锤炼语言技能,成为更有能力的外语使用者。周贝、孙晨均提到参编夯实了他们的语言功底。

这样的注释过程虽然漫长而艰辛,但却是应有的治学态度,也大大提升了我个人的语言能力、文学素养及鉴赏能力。(周贝-R^③)

周贝为确保“文学角”板块中重要词句的注释科学合理,“查阅了大量文学作品的解读文献及文学评论”,阅读鉴赏和翻译能力得以提高。此外,她还在访谈中提到,在一次线下研讨中,教材总主编就一个例句的修改和她展开了讨论,这使她理解了如何在教材编写中实现语言的自然性、真实性。(周贝-I^④)

孙晨也表示,在参编过程中接触了大量外语语篇和视频材料,增加了优质语言输入,并通过编写活动提高了对语言的“准确性、优美性”及词汇的“恰当性”的敏感度。(孙晨-I)

第二,中学教师可在编写组里与来源各异的成员合作,各自发挥所长,推动教材编写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强化能动的外语教学实践者这一身份。以江明为例,她在访谈中提道:

因为我们在跟大学教师互动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点,他们的理论知识非常强,这是让我非常震撼的,我们缺的就是这一点。而一线教师对于高考、平时学生的练习,以及学生的水平是非常了解的。(江明-I)

可见,江明在教材编写中认识到了作为教学实践者,其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不足;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其优势在于教学经验丰富,更能把握师生需求。基于此,一线教师能动地在教材编写各环节发挥长处、弥补劣势;也会“看到自身的不足和差距,极大地激发了自己学习进取之心。”(王君-R)

第三,中学英语教师在教材编写组中通过接受培训、与他人互动交流、主动学习等方式习得并磨炼了教材编写技能,逐步获得教材编者身份。例如,孙晨对参编前后阅读课标的不同心态的描述,体现了其编者身份带来的视角的变化:

以往可能是站在一个备课教师或是参赛教师的角度去阅读(课标),那么现在的话,因为(教材编者)是需要把这些内容,无论是新课标还是教材的一些精神通过编写的形式再阐述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更加仔细,关注教材中比如说单元教学目标的设置,包括新课标的一些价值引导方向性的一些东西。(孙晨-I)

此外,他主动学习编写理念。比如,为达到“国家标准”,他“很认真地专门去研读”新课标。(孙晨-I)可见,教材编者身份的构建寓于教材编写技能锤炼的过程中。

最后,鉴于中学教师既是教材编者也是教材使用者,中学教师在外语教材编写中获得了多向的理论-实践跨界者的身份。一方面,教师从学校共同体跨入教材编写共同体,将外语教学实践经验迁移至教材编写实践。另一方面,参编教师通过从教材编写共同体跨回学校共同体,将新课程、新教材理念辐射到一线。以江明为例:

有一个参编教材的老师在学校的话,就可以更好地解释教材的编写的理念、活动设计的依据和意图等……我觉得在实施高中英语新教材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学校的高一还是比较顺畅的。(江明-I)

江明认为自己在课改理论前沿和一线教学实践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话语传递者”,她把新课标、新教材的理念传递给所在学校共同体的老师,推进学校教学的革新。(江明-I)

综上,一线教师在参编过程中实现了多重身份的协商。中学教师在教材编写活动中提高了英语能力,重构了外语使用者的身份,印证了教材编写活动可提升教师语言能力的论述(刘传江、焦培慧 2017; 徐锦芬 2023)。另外,外语教材编写组异质的成员构成和良好的氛围使得中学教师在编写中不断更新自我定位,主动发掘自身优缺点(Lyu & Li 2024),建构了能动的外语教学实践者的身份。此外,与 Banegas 等(2020)基于高校语境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的中学英语教师还通过参编获得了教材编者的新身份。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 Shu 等(2023)对参编过程中高校研究者和中学教师从各自原有共同体跨越到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描述,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参编的中学教师不仅从原有的学校共同体跨入教材编写实践

共同体,且在参编后将新课程理念反哺至教学、教研一线,实现了由教材编写实践共同体向学校共同体的反向拓展,获得了多向的跨界者身份,打通了新课程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5.1.2 信念转变

中学英语教师通过参编实现了课程、教材、教学方面信念的转变。

首先,参编教师在努力对标新课标要求的过程中,内化了新课程理念,课程信念得以更新。以张帆为例: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我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来看课堂和课程。(张帆-I)

张帆表示参编前“不一定经常看”新课标,由于编写教师用书严格要求对标,参编后她努力研读新课标,学习“课标解读有关的东西”。为了在编写时随时查阅,张帆甚至“买了三本课标”。长期下来,她对新课标“越来越熟悉”,视野也从只关注一线教学的微观实践,拓宽到考虑“之前没关注到的”宏观课程结构。(张帆-I)

另外,中学英语教师的教材信念发生了转变。通过学习教材编写基本原理,吸收前沿优秀教材理念,中学教师不再盲目崇拜教材,而是批判地解读教材。郑远和江明均提到这样的变化。

如果我们国内教材的视听板块能够按照这样的标准录制音频,大胆截取真实环境下对话中的片段,最大程度保留人物情感和背景音,是不是会让学生更有趣学,同时教学成果也会更显著呢?(郑远-R)

郑远在参阅国外优秀听说教材时,反思现行教材的视听资源,找到了差距。江明则是在主编的影响下,实现了由“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变化。她意识到需摒弃将教材视为“牢笼”的固定思维,坚信教师在教材使用中拥有广阔的“发挥空间”,形成了“教材是工具”的教材观,并敢于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江明-I)

最后,中学英语教师在教材编写中更新了教学信念。例如,国外经典教材不仅为郑远提供了教材编写灵感,同时“也为语法教学带来了新思路。”(郑远-R)秦朗也叙述了自身教学信念方面的变化:

英语学习活动观能让学生真正地成为课堂的主人……让他们成为课堂师生互动、生生交流的主角……现在的教学应带领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深度挖掘文本主题和意义。(秦朗-I)

参编前,她的教学“没有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参编后,她领悟到新课标提倡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并意识到将其融入教学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秦朗-I)

可见,本研究中的教材编写活动使中学英语教师实现了关于课程、教材、教学的信念的转变。前人基于高校语境的研究发现大学英语教师在课程信念(徐锦芬 2023)、教学信念(刘传江、焦培慧 2017)上有明显变化。与之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参编中学教师在教材信念方面的转变较为突出。笔者认为,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的理论基础差异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略有不同的主要因素。在本研究中,教材编写活动在赋予中学教师一定程度的课程内容决策权的同时,提供了优质教材资源、外部专家支持,以促进中学教师对相较薄弱的教材编写原理的主动学习,因而使他们更新教材信念。

5.1.3 实践改进

本研究发现,中学英语教师在教材编写中磨练了编写技能,提升了教学专长。首先,中学英语教师的教材编写技能得到了锻炼。例如,经验编者在审读环节的建议优化了郑远的活动设计:

通过这一批注,我对活动目标和单元教学目标的一致性有了更直接和清晰的认识,随后便调整思路,以挖掘罗莎琳·富兰克林的性格为出发点,要求学生仔细阅读篇章,并根据细节和事实归纳主人公身上优秀的科研品质……课堂活动设计和教学目标是否一致就像标尺一样,成为我在设计活动和修改过程中必须考量的要素。(郑远-R)

在郑远看来,经验丰富的编者通过批注提出的修改建议,不仅助力她优化活动设计,还引导她将编写原则内化于心,进而调整编写的方法。周贝还提到,教材编写组良好的合作氛围使得参编教师敢于主动向经验编者寻求帮助,在短时间内提高产出质量。(周贝-I)

秦朗表示,除了在编写实践上取得进步外,她还明显感到自身教学行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秦朗-I)王君也在访谈和反思中提到,通过反思各方审读意见、主动研读材料文件、参加教材编写组的培训和讲座,她不仅掌握了新课标的内容和要求,还更新了教学理念,并将这些新理念“反哺”到她当下的课堂教学,提升了“教学素养”。与之类似,孙晨表示,作为一个编者,他要把新课标的精神和编写理念“通过编写的形式再阐述出来”,这一过程助力他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使他设计的教学活动不再是“空中楼阁”,变得更加“有据可循”。(孙晨-I)

基于上述发现可知,中学教师集编者、使用者于一身的双重身份属性,使他们在参编的过程中改进教材编写实践的同时,也优化了教学实践。这与胡志雯等(2018)和徐锦芬(2023)在大学教材编写语境中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另外,教材编写作为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活动,提供了“大量构建新知识的机会”(胡志雯等 2018: 33),中学教师编者在教材编写实践中习得、践行、内化教材编写理念,进而迁移至日常教学和教研实践中,促进了教学实践的整体更新。

5.1.4 情感调节

在参编过程中,中学英语教师体会到融洽的合作关系和成就感等积极的情感体验。诚然,教材编写这项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的工作,必定会为参编教师带来负面情绪冲击。在本研究中,教材编写组和谐的合作氛围,以及编者的使命感和成就感,涵养了教师心理韧性,助力他们渡过心理难关。例如,郑远在反思中总结参编过程时说道:“虽然有挑灯夜战的辛苦,但更多的是学习的充实感和收获的幸福感”。这种“充实感”与“幸福感”激发了正面的精神力量,不仅推动了她继续学习,还成为她在生活各方面持续向上的内在动力,是“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郑远-R)李青坦言,参编过程中“酸苦辣真的是远远多于甜”,她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庆幸的是有合作编者的一路支持陪伴,她逐渐排解了负面情绪,“坚持了下来”。(李青-I)王君也提到教材编写组良好的合作氛围激发了积极的情感体验:

在教材编写组其实挺开心的,虽然干活很苦,但是大家的劲都朝一个方向使,就会很有动力,尤其是我的观点正好和其他老师不谋而合时,那时就体会到同道中人,非常开心。(王君-I)

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王君与同侪通力合作。到了教材编写的后期阶段,王君发现她负责的单元必须更换语篇,这意味着她需要重新设计单元活动,那时的她已然徘徊在崩溃边缘,“走不动了”。得益于“对编写核心团队的理念和能力及品质的信任,以及团队成员彼此之间不离不弃的支撑”,王君最终顺利完成编写任务。(王君-R、I)周贝和江明还提到,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所赋予的“强烈的使命感”,使她们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学会了像西西弗斯那样——与其在抱怨中将一件事变成痛苦的折磨,不如选择斗志满满地去推动那块巨石”,帮助她们塑造了积极的心理品质。(周贝-R;江明-R)

可见,教材编写活动有效地增强了参编中学教师的情感体验。情感是现有外语教师学习结果研究甚少涉及的维度。通过深度挖掘,本研究中的数据涌现出了多样的情感类型,包括使命感、自信、成就感、喜悦等积极情感(Popovici & Bolitho 2003; Shu et al. 2023; 胡志雯等 2018),以及压力、痛苦、沮丧等消极情感(Shu et al. 2023; 胡志雯等 2018; 徐锦芬 2023)。与前人针对大学英语教师的研究所发现的教师情感调节过程类似(胡志雯等 2018; 徐锦芬 2023),本研究捕捉到了中学教师在教材编写中借助多边、良好的合作关系调节情感的过程,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心理韧性的变化,体现了其在参编过程中情感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展现了参编教师的“全人”发展。

5.2 教师学习条件

通过剖析中学英语教师的参编学习经历,本研究基于活动理论,发现教材编写活动促成外语教师学习的主要因素包括积极的主体、明确的目标、丰富的工具、完备的规则、异质的共同体、互补的分工方式。

首先,在教材编写活动系统中,一线教师作为主体得以充分发挥改革能动者的作用。在教育实践中,一线教师往往是教育政策的下位执行终端,然而本研究中的教材编写活动极大地赋权中学教师在课改中发声,激发了他们学习的能动性。例如,前文提到多位参编教师感受到的课程教材编写带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大大调动了”周贝的“主观能动性”,使她为了精进编写实践“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与专业瓶颈”,进而“获得了专业上的提升与发展”。(周贝-R)

其次,教材编写活动系统中工具丰富,包括优质的图书资源库、实用的辅助资源、针对性的讲座培训及指导。首先,教材编写组建立了共享的国外原版教材资源库,旨在帮助编者树立先进和开放的教材信念。除资源库外,多位编者表示编写组提供了“一些软件、网站”来搜索选文及设计活动。(孙晨-I)此外,经验编者及专家的培训和指导也是促成外语教师学习的有效工具。与Dunst等(2015)关于在教师学习过程中须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的论述一致,在本研究中,参编教师除了主动学习,还通过教材编写组的专家讲座及培训,学习新课标、教学理论以及外语教材编写原理等,精进教材编写技能。例如,刘言提到,作为新手编者,经验编者给予的指导和培训使她的教材活动设计的“质量和层次提高了很多”,而参编过程在她看来也是专家帮她“磨课”的过程,使她“学到很多东西”。(刘言-I)

再次,教材编写活动客体是“共同产出可评价、可反馈、可供使用的合作产品”(杨姗姗等 2023: 54),即产出一套符合国家标准、达到国际水平、兼具上海特色的高质量的英语教材。为实现活动客体,参编教师的学习目标明确且具体,学习内容与日常教学息息相关。首先,

“教材必须具备科学性”(束定芳 2023: 25),外语教材的语言内容要真实、准确、规范,这对参编教师语言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本研究中的教材编写活动为参编教师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目标语环境,不仅有高质量的语言输入,而且有高要求的语言输出。具体来说,参编教师深度参与了从多模态文本搜集到稿件审校的诸多环节,亲自选编甚至创编了英语语篇,且有机会与优秀同侪和外语界专家探讨语篇内容和活动设计,还有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或教材工作者进行润色修改。可见,教材编写中的语言学习基于并超越外语教学实践需求,参编教师的外语学科知识提升效果显著,体现了外语教材编写中教师学习的独特之处。此外,为了达成符合“国家标准、国际水平、上海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产出目标,参编教师主动学习新课标,“基本上把课标什么的反反复复地读”。(刘言-I)同时,中学教师参阅国外优秀原版教材,通过研习“大量国内外相关的专业著作与论文”来夯实应用语言学、教育学理论基础。(周贝-R)参编教师还扎根本土需求及学情,基于编写团队前期对上海各区的语法学习调研数据及自身教学经验,“提出了新教材语法体系的构建思路”。(秦朗-I)总之,本研究中的教材编写活动目标明确,为参编教师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学习机会,激活了教师持续的自主学习动机(Darling-Hammond et al. 2017)。

另外,本研究中的教材编写活动具有完备的规则,尤其是在编写反馈环节,即“编写、反馈、修订、再反馈”(杨姗姗等 2023: 53)的支持下,参编教师有机会通过反思自身编写经历,并结合经验编者及专家的评价和建议等进行学习。例如,周贝认为在同册互审过程中,她不仅会收到“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而且在她审读其他单元时,还能学习借鉴他人“别致出色的学习活动设计”。(周贝-R)可见,参编教师能够跨越时空限制,与经验丰富的同侪和国内外专家直接对话交流,有效地增强了教材编写的技能。

最后,异质的共同体及互补的分工方式带来的多层次的合作也是教材编写活动促进教师学习的重要因素。前序研究发现教材编写组成员异质性较高,涵盖了一线教师、教研员、高校研究者、编辑等(Shu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25),可促进研究者和实践者双方实现各自所有的优势能量的流动和交换,为互相学习创造机会(Shu et al. 2023)。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同时还发现,教材编写活动超越时空界限,为中学教师、教研员、高校研究者、出版社编辑、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各方专家等提供了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在此基础上,互补的分工方式使得异质的成员得以进一步融合,促使外语教育的相关利益方在共同的产出目标下求同存异。例如,孙晨认为他所在的分册团队中既有教研员,又有资深编者,还有年轻的优秀教师,他们之间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孙晨-I)中学英语教师跨越边界,对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建立更为清晰的认识,增强了其能动性。另外,在本研究中,编者建立起了积极的合作关系,为编者的情感调节积蓄了能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中学教师在教材编写活动中将所学到的相关理论进行个性化实践应用,通过主体、工具、客体、规则、共同体、分工方式之间的持续变化的互动,使教师“将上位的教学理念与抽象的教学理论内化”,助力教师“突破教师专业发展的瓶颈”,实现身份、信念、实践、情感的转变。(周贝-R)根据研究结果与讨论,笔者基于活动理论构建了外语教师有效学习机制(图 1)。该框架外圈表示促成中学英语教师学习的关键因素,包括教师活动系统相互关联的六个要素。该框架内圈表示参与活动的教师学习的目标结果,可体现在身份、

信念、实践和情感四个维度。外圈的关键因素通过整体性的外语教师活动形成合力,共同促成外语教师的学习。有效的外语教师学习活动不仅考虑教师信念和实践维度的学习目标,如转变外语教师在课程、教材、教学方面的信念,改进教师日常教学、教研,乃至学习活动涉及的新实践,还应重视提升教师参与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助力教师通过情感调节提升积极心理品质,实现教师多元身份乃至跨界身份的获取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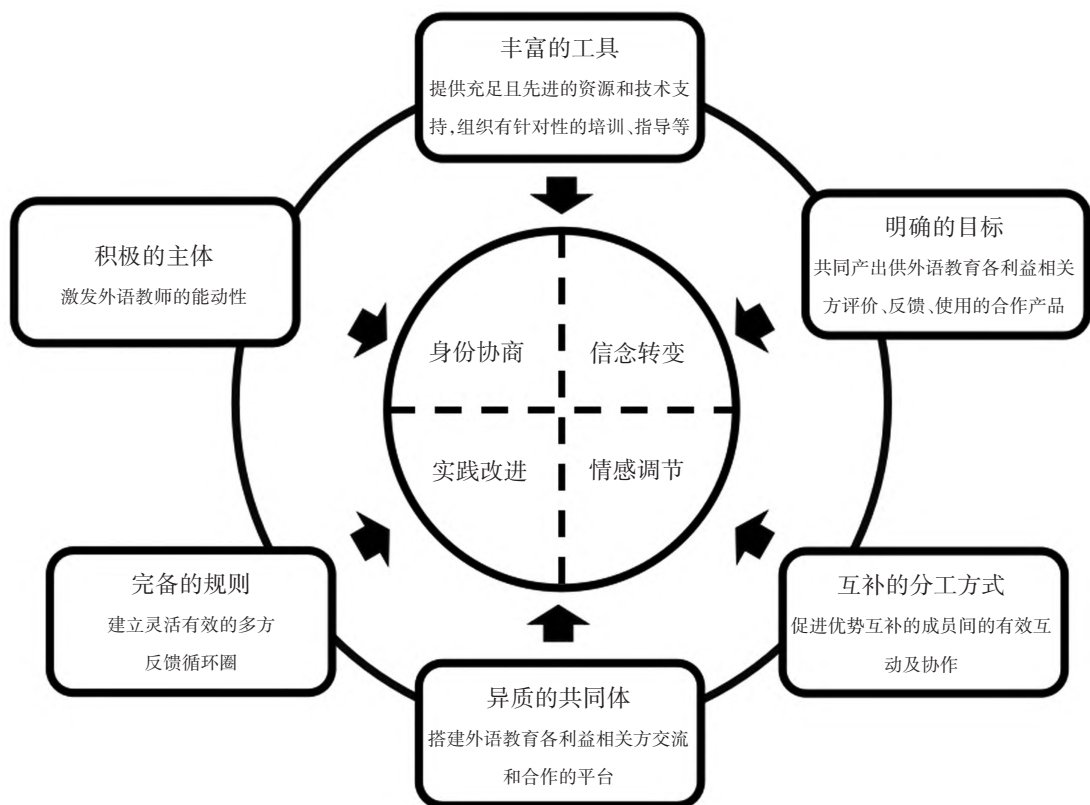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活动理论的外语教师有效学习机制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活动理论深入分析了某套新课标高中英语教材编写项目中中学教师的学习经历,探究了教材编写中的教师学习结果及条件。研究发现,外语教材编写需满足明确性与具体性的高标准,教材编写组创造了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和真实的学习机会,推动了多方合作,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指导,从而促进了参编教师的学习,以及他们在身份、信念、实践和情感方面的成长。本研究的发现支持了学界对将外语教材建设作为教师专业发展新途径的呼声。未来的外语教师教育项目应紧紧围绕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工作,关注外语教师的真实需求,创造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场域,构建长期存续的、成员异质的、关系平等的跨界共同体,激发教师的能动性,促进教师的全人发展。此外,在教师“做中学、学中做”的同时,教师教育者应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需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为教师访谈和教师反思,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参编教师的生活世界,采用客位视角观察其教学实践,跟踪教师参编前后教学实践的变化和发展。

注释:

- ① 出于学段衔接的考虑,本套高中英语教材主编团队邀请了部分优秀初中英语教师加入编写组。
- ② 该表中呈现的教师名字均为化名。
- ③ R表示引言来自反思(reflection),下同。
- ④ I表示引言来自访谈(interview),下同。

参考文献:

- [1] Banegas, D., K. Corrales & P. Poole. 2020. Can engaging L2 teachers as material designers contribute to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dings from Colombia[J]. *System*, (91): 102265.
- [2] Bouckaert, M. 2019.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eachers as materials developers: Why, what, and how?[J]. *RELC Journal*, (3): 439-456.
- [3] Cordingley, P., S. Higgins, T. Greany, N. Buckler, D. Coles-Jordan, B. Crisp, L. Saunders & R. Coe. 2015. Developing great teach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s into 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OL]. <https://tdtrust.org/about-dgt/>, accessed 27/03/2025.
- [4] Darling-Hammond, L., M. Hyler & M. Gardner. 2017. *Effectiv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R]. Palo Alto: Learning Policy Institute.
- [5] Dunst, C., M. Bruder & D. Hamby. 2015. Metasynthesis of in-servi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educator and student outcomes[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12): 1731-1744.
- [6] Engeström, Y. 1987. *Learning by Expanding: An Activity-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al Research* [M]. Helsinki: Orienta-Konsultit.
- [7] Johnson, K. 2009.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Routledge.
- [8] Lyu, C. & S. Li. 2024. Feeling incompetent drives me to learn: Unraveling teacher learning mechanisms in EFL materials development[J]. *RELC Journal*, <https://doi.org/10.1177/00336882241229458>.
- [9] Miles, M., A. Huberman & J. Saldaña. 2013.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Methods Sourcebook*[M]. Thousand Oaks: Sage.
- [10] Popovici, R. & R. Bolitho. 2003.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writing: The Romanian textbook project[A]. In B. Tomlinson (ed.). *Developing Materials for Language Teaching*[C]. London: Continuum.
- [11] Shu, D., S. Yang & M. Sato. 2023. Cultivating a new ELT ecosystem: A focus on researchers in a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ject[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 405-427.
- [12] Stake, R.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ies Research*[M]. Thousand Oaks: Sage.
- [13] Taşdemir, H. & A. Karaman. 2022.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A synthesis of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2006 and 2020[J]. *Review of Education*, (1): e3350.
- [14] Van, H. 2022. Effects of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on teachers' oral corrective feedback practices [J]. *System*, (110): 102917.
- [15] Yin, R. 2018.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 (6th Edition)[M]. Thousand Oaks: Sage.
- [16] Zhao, J., C. Li & D. Shu. 2025. Language teachers' collaborative 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a textbook

- writing community of practice[J].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1): 109-120.
- [17] 程晓堂 孙晓慧. 2011. 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8] 崔琳琳. 2013. 外语教师学习研究述评: 理论、主题与方法[J]. 中国外语, (6): 103-109.
- [19] 胡志雯 稷建中 蒋珍云. 2018. 项目实践共同体中教师合作学习及其对专业发展的影响[J]. 外语界, (4): 27-35.
- [20] 黄忠敬 程亮. 2021. 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脉络与改革创新——为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而作[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0): 12-26.
- [21] 康艳. 2022. 外语教师学习[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2] 刘传江 焦培慧. 2017. 教材开发实践对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探究[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26-133.
- [23] 刘学惠 申继亮. 2006. 教师学习的分析维度与研究现状[J]. 全球教育展望, (8): 54-59.
- [24] 孟亚茹 崔雨. 2023. 外语教师混合式教学形成性评价素养与发展路径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5): 86-98.
- [25] 束定芳. 2023. 教育生态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构建[J]. 外语界, (6): 20-32.
- [26] 孙有中. 2021. 序言[A]. Ian McGrath. 英语教材与教师角色: 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外语教育出版社.
- [27] 魏戈. 2019. 矛盾驱动的教师专业学习: 基于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研究的案例[J]. 教育发展研究, (4): 24-34.
- [28] 利维·维果茨基. 2016. 陈会昌等译. 维果茨基全集(第3卷): 新心理学的基本理论[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9] 夏洋 唐雅琪. 2023. 内容语言融合课程教师实践性知识与自我效能感发展个案研究——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 山东外语教学, (6): 42-53.
- [30] 徐锦芬. 2023. 外语教材建设: 教师专业发展新途径[J]. 外语界, (6): 12-19.
- [31] 杨鲁新 黄飞飞. 2022. 高校英语教师国内访学期间身份转变个案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107-115.
- [32] 杨姗姗 束定芳. 2021. 大学英语教师专业身份发展中的情绪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5): 47-56.
- [33] 杨姗姗 束定芳 王蓓蕾. 2023. 高校外语教师教育者在教材编写中的专业发展研究[J]. 外语教学, (6): 49-55.
- [34] 周洲. 2023. 基于课例研究的实践共同体对外语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的案例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6): 64-73.

new textbook use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s positive, and the impacts on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teacher knowledge are relatively higher;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eachers' textbook belief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new textbook use, in which "textbook as suppor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3) there are n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nglish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textbook use, such as years of teaching,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professional titles or school types. The study ha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ers, administrations,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nd textbook writers.

Key words: textbook us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Impact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Compilation Activity on Teacher Learning: A Case Study on a New Curriculum-Based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ject, p.84. WU Dandan & SI Lu

This case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textbook compilation activity in promoting teacher learning, focusing on 9 school teachers involved in a new curriculum-based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ject.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reflections and documents,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lens of activity theor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motes teacher learning, which is manifested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identity, belief, practice, and emotion. Furthermore, factors facilitating teacher learning include empowered subjects, well-defined object, diverse tools, established rules, heterogeneous community, and complementary division of labor.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nsights for future teacher education initiatives.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compil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learning; basic education; activity theory

A Study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Revision, p.97. FENG Quangong

Literary translation inevitably involves revision, including the translator's self-revision and other-revision done by editors, revisers and so on. All revisions are motivated or done for certain reasons regardless of the identity of revision subjects.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revisions are done by analyzing many specific revision examples from works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Xu Yuanchong, Howard Goldblatt and so on. These reasons ar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namely internal reasons,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mis-translations,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the pursuit of literary beauty, the shift of a translator's views on translation, and external reasons, such as the aging of translated language, poetic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arget culture, market considerations and so on. A revision act might be motivated by many reasons, internal or/and external, for different purposes. Sorting out various reasons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revision is instrumental to making a